

南方丝绸之路 文化论

南方丝绸之路文化论编写组 编



前　　言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开放的民族，早在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川滇之间的崇山峻岭之中，开辟了一条与外界联系的纽带——南方陆上丝绸之路。这是中国通往外界的最早一条通道，她把中国介绍给世界，又把世界介绍给中国。她始于成都，北与中原相联。南分东西两道，西道沿“牦牛道”而行，经雅安、汉源、越西、西昌、会理、攀枝花、大姚而至大理；东道经乐山、犍为至宜宾，跨金沙江，沿“五尺道”经盐津、大关、昭通、贵州赫章、宣威、曲靖、昆明、楚雄而抵大理。两道汇合后，又经保山、腾冲、德宏，而至缅甸，抵达印度。从印度则可到中亚以及欧洲、非洲诸国。古代文献与文物考古资料证明，早在秦汉时期，蜀地的丝绸蜀布、邛竹杖、铁器就沿着这条通道，运销东南亚和西亚地区，印度和中亚的玻璃、宝石、海贝，以及佛教艺术、哲学思想等也沿着这条古道传入我国。只是到了中世纪以后，这条古老的国际交通线才逐渐衰退，而被历史的尘埃所掩没……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对北方丝绸之路和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开发已走向深入，而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则比较薄弱，为了重开南道，我们川滇两省古道沿线14家文博单位，责无旁贷地担负起这项艰巨而有意义的工作。1990年初，由凉山州博物馆、大理州博物馆、攀枝花市文管处联合发起举办“南方丝绸之路文物摄影艺术展览”，得到古道沿线的成都

市博物馆、雅安地区文管所、乐山市文物研究所、宜宾市博物馆、昭通地区文管所、曲靖地区文管所、昆明市文管会、楚雄州文管所、丽江地区文管所、保山地区文管所、德宏州文管所等单位的积极响应，从4月大理开展至1991年元月成都闭展，共精选了260余幅反映古道沿线风光名胜、文物精华和民族风情的作品，在参展单位驻地的城市巡回展出，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新闻界的极大关注与反响，掀起了南丝路研究的一个小高潮。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南丝绸之路的研究，已不能停留在表面的直观介绍和通俗读物的著述方面，而应着力于对南丝路的准确走向，开凿时间，南丝路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南丝路沿线文化结构层次的异同，以及重开南丝路的现实意义等深层文化内涵的挖掘与研究上。为此，1990年8月，由凉山州博物馆主办，在西昌市召开了“西南丝绸之路学术讨论会”，收到论文50余篇，经过精选，汇编成集，这就是我们献给广大读者的这本《南方丝绸之路文化论》。

我们虽有实地踏勘经验和考古第一手资料，但受学识所限，论文难免肤浅，抛出本文集，意在求教方家，期盼引起学术界重视，而使南丝路研究引向深入。

编 者
一九九一年三月

《南方丝绸之路文化论》编委会

木基元	邓耀宗	刘 弘	卢升弟
余永恒	肖 林	李枝彩	范建华
周荣华	张 楠	高庆和	唐长寿
秦保生	游有山		

目 录

前言 编者(1)

• 古道考述 •

- 西南古道与王朝开边 范建华(3)
略谈汉王朝对西南夷道的开凿与管理 刘 弘 邹 麟(22)
古代青衣江上游的郡县建置 周曰琏(35)
五尺道曲靖段初考 李保伦(45)
唐以前昆明的古道以及在历史中的作用 李安民(53)
南方丝绸之路楚雄段述论 肖 林(74)
博南古道考说 李东红(82)
揭开乘象国之谜 马向东(94)

• 文物遗址 •

- 从出土文物看古代滇蜀关系 吴 怡(113)
岷江中下游汉崖墓砖室墓形制等级浅析 唐长寿(120)
汉越嶲郡郡治地望考 张正宁(137)
唐嶲州城与南诏、大理国建昌城初探 刘世旭(146)
西南丝路上的古么些人与插竿挂肢葬
..... 叶大槐 娄德宗 王成孝(160)

云南型铜鼓北传路线之新证	木基元(167)
从永胜文物古迹看西南丝绸之路	张顺彩(179)
从大理出土文物看蜀身毒道的开发	田怀清(185)
西南丝绸之路上的早期铜鼓	李俊(195)
姚安地区的青铜文化	郭开云(204)
万家坝部份青铜器与东南亚青铜文化的联系	张家华(212)
滇西南地区的青铜文化	李枝彩(220)
怒江中游考古综说	耿德铭(231)

• 交通贸易 •

从成都车马画像砖看汉代交通的发展	卢升第(255)
试论严道城在南方古代贸易道路上的作用	李晓鸥(267)
南丝绸之路的开凿与形成	李森(280)
曲靖与西南丝路	任宁云(296)
汉晋以前昭通与外地的联系	游有山(313)
纳西族与滇藏贸易古道	王志泓(319)
名城丽江的古桥梁	李共久(326)
川滇缅印古道上的大理马帮	张锡禄(336)

• 文化交流 •

西南丝路上各民族乐舞艺术的交流与融合	李瑜(353)
古蜀国竹崇拜探源	邓涛 罗曲(358)

试论南诏佛教的传入	王海涛(366)
石窟寺与摩崖造像艺术	张楠(379)
博什瓦黑岩画与石钟山石窟的文化异同	
.....	唐亮(386)
商周时期的蜀文化与南方丝路西线的关系	
.....	及康生(394)
宜宾经济文化考述	秦保生(402)
后记	编者(414)



古道考述

西南古道与王朝开边

范建华

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是不言而喻的。而南丝路作为一条具有悠久历史的古道，其更为重要的是在王朝开边中的战略地位，它是中原王位开边、治边，将西南广大地区纳入王朝版图，并赖以维系其统治的十分重要的一环。王朝开边，以开道始；王朝略边，依道通否定；王朝治边，沿道设据点。总之，中原王朝在西南边疆的一切活动离不开道，依赖于道，古道与王朝的关系极为密切，古道在王朝开边略边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开道与开边

西南边疆与祖国内地的联系，在古代，主要是通过巴蜀来实现，中原王朝对云南的经略也主要是依托于四川。因而远在前四世纪前后，一条由成都经雅安、西昌，跨金沙，入云南的古道，便在川西南与云岭高原的平坝高山间，曲曲折折地铺展着自己的身子，传递着中原、巴蜀文明与古道文化的信息。然而，她毕竟只是一丝隐没于民间商旅中的红线，要把云南纳入王朝版图，要将西南广大地区牢固圈入中华的地图之中，仅靠这一丝商旅红线是难于办到的。

秦帝国的建立，大一统的出现，使王朝对周边开发的信心更足了，王朝对西南夷的开发也就随之而来。

西南夷，是一个地域概念，它是秦汉时期对今天云南全境，贵州西部、四川西南部以及缅甸、越南北部广大区域的统称；它也是一个族群的概念，它是秦汉时期中原人对居住在这一区域内的夜郎、滇、句町、叟、僰、昆明邛笮等部族的总称。这里地广物丰，虽较中原落后，但生产生活自成体系，形成了以黔西地区为中心的极为发达的夜郎文化圈，和以滇池区域为中心的璀璨耀眼的古滇青铜文明。《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①”。这说明了在夜郎、滇、邛都等区域内，已跟中原相埒，发展成为定居的农业文明。这样一块丰腴之地，对于刚吞并六国、统一全国的秦始皇来说，必然采取行动，进行开边。于是便派“常頫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②”。常頫，大约为秦蜀郡守，他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在西南夷“开道置吏”，通过开道置吏，将西南夷置于秦王朝的统治之下。常頫基本完成了这一任务。修筑了第一条由四川通往云南的官道——五尺道，进而达到了“置吏”的目的。

“五尺道”，是在原李冰父子修筑之“僰道”的基础上延伸修筑的。公元前316年，秦将司马错灭蜀，秦在成都设了蜀郡，之后蜀郡守李冰及其子，便开始修筑从成都循岷江而下，达僰道县（今四川宜宾）的道路。此路亦称“僰道”。李冰用集薪焚石、浇水爆裂的方法，在陡峭的岩石上凿道，获得了很大成功。常頫继承李冰的事业，从僰道将道路延伸修筑到味（今云南曲靖），以沟通滇与巴蜀的关系。此道，因山高水险，不易开凿，宽仅五尺（当今三尺左右），故称“五尺道”^③，

起于今四川宜宾，经高县、筠连，入云南元津、大关，经昭通、镇雄，折入贵州毕节、威宁，再入云南宣威，抵曲靖，全长近千公里。

“五尺道”，是在原蜀身毒道东道的基础上，由政府正式委派官员组织修筑的，它是官方修到云南的第一条道路。有了此道，王朝对西南夷腹地的深入，以及置吏进行统治才有了可能，所以说开道是开边的第一步。

秦王朝毕竟太短暂了，“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闭（原为“开”从方国瑜改）蜀故徼”^④。由于秦的灭亡，秦对西南夷的经略犹如昙花一现，及至西汉建立，通过秦暴政和楚汉战争的忧患，新建的王朝，无力顾及远在徼外的西南边地，所以才开通的官道又中断了，所置的官吏也就自然废弃了。

秦对西南夷的经略，虽因其灭而终，但它对西南夷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秦修五尺道，为后来历代王朝开边找到了一条捷径，所以历代王朝经略云南总是从开道入手，西南夷地区反抗王朝的统治也总是从阻道毁城开始，开道与开边成了一对不可分割的连体兄弟。

中央王朝在西南夷地区的统治地位得予确立，郡县制度在西南夷得予实现，将西南夷最终纳入王朝版图，是从南夷道和西夷道的开凿开始的，也是以这两条道路的开通为标志的。

经过汉初的生养休息和七、八十年的恢复与发展，到了汉武帝时，西汉王朝已达到了鼎盛时期。好大喜功的武帝，北击匈奴、南伐南越、东伏诸夷，同时也开始了对西南夷的经略。

武帝经略西南夷，是当时北击匈奴的总方针下的一项重要内容。受匈奴所隔，当时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大月氏（今新疆西部）等西域诸国，难与中国通好，且他们亦受匈奴之

祸，武帝希望寻找一条由巴蜀至滇入身毒（今印度），达大夏诸国的交通线，以联合西域诸国共击匈奴，于是对西南夷的经略便成了北击匈奴战略重点的重要组成部分；再者，西南夷的笮马、僰僮、旄牛也使武帝唾涎。这样，经营西南夷的问题，便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为了建立一个经略西南夷地区的据点，西汉王朝在高后六年（公元前182年）便在秦僰道故地置僰道县，武帝时便进一步加强了对蜀僰青衣道的建设。先是修复秦李冰、常颂修筑之“僰道”，接着便向西南和东南延伸修筑西夷道和南夷道。史载：“武帝初，欲开南中，令蜀道僰、青衣道。建元中，僰道令通之，费功无成，百姓愁怨，司马相如讽谕之。使者唐蒙将南入，以道不通，执令，将斩之，叹曰：‘忝官益土，恨不见成都市’！蒙即令送成都市而杀之。蒙乃斩石通阁道。故世为谚曰：‘思都邮，邮令头’云。后蒙为都尉，治南夷道”^⑤。由此可见王朝把开通西南夷的交通看得如此之重，唐蒙开道也颇有铁腕手段，他主持开蜀僰青衣道，取得成功，僰道县成了西汉王朝开边稳固的据点，接着又被委派主持修南夷道，司马相如负责开南夷道，正式开始了对西南夷的经略。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闽越（指在今福建一带的越族）攻南越（指在今广东一带的越族，与闽越同为汉朝的藩属），武帝遣大行（官名，掌诸侯与内附的少数民族朝吊时的接待、贺礼等事。）王恢率兵往救南越，兵尚未至，闽越内哄，闽越王部下杀其以降汉，兵罢，派鄱阳令唐蒙晓谕南越王归附。南越王虽内附，但阳有二心，为加强对南越的控制，武帝拜唐蒙为中郎将，专司其事。蒙在南越得知从夜郎沿牂牁江（今北盘江，发源于云南曲靖马雄山），可直下番禺（今广州市），于是经略夜郎便成了开西南夷的第一步。。

要经略夜郎，除了政治招徕外，更重要的是开南夷道。唐蒙“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⑥，道通，便可以发挥“兵威”的优势。加上“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于是，南夷道通。道通后，便在僰道县设置犍为郡，并将夜郎诸部置于犍为郡辖。这是王朝在西南夷地区设置的最早的一个郡，其范围主要在今四川宜宾地区、黔西北和滇东北。南夷道亦即从僰道出发，沿五尺道遗迹，向东深入贵州腹地，直下两广。由于该道系唐蒙所开，史书亦称之为“唐蒙道”。

稍后，武帝又别遣司马相如，积极开西夷道，大约在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邛笮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臣妾，请吏，比南夷。天子问相如，相如曰：‘邛、笮、井、駢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置。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天子以为然，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固巴蜀吏币物以賂两夷……司马长卿（即相如）便略定西南，邛、笮、井、駢、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隘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⑦，“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从而在今四川南部的雅安、西昌等地设置早的郡县。西夷即后来越巂郡各部族；西夷道即灵关道，它是在原“旄牛道”的基础上开凿，从成都出发，往雅安，至西昌，过金沙江，抵大理。

开西、南夷道，设置郡县，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王朝深知，有道方能进兵，方能保证守土的辎重给养，设郡置吏才有可能实现，也才能保证官吏代表王朝对西南夷地区进行有效的统治。同理，西南夷地方土酋，也知道开道虽能带来中原先进的物质资料和某些好处，但对于这些排他性极强、又不愿受人

节制的少数民族首领们来说，从他们自身的私利出发，开道对他们封闭的族部权益毕竟带有极大的威胁性。于是阻道、杀吏便成了土酋们反抗王朝经略的极普遍的对策。《史记·平准书》载：“汉通西南夷道，千里负责馈粮，率十余钟到一石，散币于邛僰以集之。数岁道不通，蛮夷因以数攻，吏发兵诛之。”^⑧《汉书·食货志》亦载：“时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餽饟，率十余钟致一石，散币于邛僰以辑之。数岁道不通，蛮夷因此数攻（吏），吏发兵诛之。”^⑨《史记·西南夷列传》也说：“当是时，巴蜀四郡（《集解》徐广曰：“汉中、巴郡、广汉、蜀郡”）通西南夷道，戍转相饟。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耗费无功。”^⑩由于“僰道以南，山险高深，^⑪”“高山嵯峨，岩石磊落，倾侧萦回，下临绝壑，行者板缘，幸缘绳索。三蜀之人及南中诸郡，以为至险，^⑫”开凿西南夷道十分艰难，征发开道的士卒均为巴蜀之人，年岁旷久，巴蜀之人不堪其苦，纷纷要求罢西南夷，且西南夷土酋又数度攻吏、阻道，使得武帝经略西南夷的方针不得不进行调整。为慎重起见，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任公孙弘为御史大夫，前来巴蜀巡视。返回长安后，公孙弘“数言西南夷害，可且罢，专力争凶奴，^⑬”“上乃许之”^⑭，于是“秋，罢西南夷。^⑮”

从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到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西汉王朝前后经营十年的开西、南夷道，由于不明西南夷内部情况，带有很大盲目性，必然招来西南夷部族土酋的强烈反对，加上西南夷地区山高水险，凿道十分不易，耗费极重，引起巴蜀士民不满，再加上北方匈奴乃主要敌人，王朝不可能专事西南夷，因而不得不暂时作罢。这是西汉王朝开道和开西南边疆的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唐蒙、司马相如经略之

西、南夷道，虽未完全开通，但毕竟通过开道和设置犍为郡和在后来的越嶲郡靠内地区置县，为进一步深入西南夷腹地，奠定了良好基础。

西汉王朝开道与开边的第二阶段是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开始的。是年，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将其在大夏所见之蜀布和筇竹杖，以及了解到之蜀有可通身毒之道的事奏明武帝，

“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无间出西南夷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⑩”因遭更为落后的昆明族（居于今楚雄以西、大理一带的原始部族）所阻，无法通西道。道虽未通，然王然于等较唐蒙、司马相如来说，真正进入了西南夷腹地——滇国，为滇王所留，对西南夷有了更深入地了解。这时北方匈奴遭败，王朝势力更盛，因而改变“罢西南夷”的做法，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重新经略西南夷。当政治招徕不能很好生效的时候，付诸武力便成了统一的手段，流血的政治也就提到了第一位。

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反汉，“汉乃发巴蜀罪人尝击南越者，八校尉击破之”，很快平南越，并顺手牵羊“杀使者及犍为太守”，又“常隔滇道”^⑪的且兰侯（今贵州都匀、黄平一带）。次年，以兵威迫夜郎王归附，并将其地置牂牁郡；同年，在司马相如所开之西夷地置越嶲郡。

诛“常阻滇道”的且兰侯，又收服夜郎，定邛筰，西南夷几个主要的部族和外围大部地区已纳入王朝版图，剩下的便是向西南夷腹地——滇国进攻。“上使王然于以破越及诛南夷兵威讽喻滇王入朝”，滇王虽然动心，无奈居住在今曲靖一带的劳浸、靡莫之属与滇“皆同姓相扶，未肯听”，不仅如此，还“数侵犯使者吏卒”。这就激怒了惯于穷兵黩武的汉武帝，他

派大将郭昌于“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迫使滇王“举国降……于是以为益州郡”。（其过程详见《史记·西南夷列传》、《汉书·西南夷传》）。至此，西南夷广大地区已基本纳入王朝版图，郡县制度在西南夷地区得以确立。

从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到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经过30多年的努力，从唐蒙、司马相如开西南夷道始，王朝的经略分为两个阶段，即第一阶段（建元六年至元朔三年）以开道建立据点为主；第二阶段（元狩元年至元封元年）以兵威武力征服为主。及至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永昌郡设置，整个西南边疆已完全纳入王朝版图，奠定了中国西南边疆的基本格局，最后完成了开边的神圣使命。

由上述我们可以看出，王朝的开边，首先由开道入手，开通西南各地的交通，对于建立王朝在西南边疆的统治秩序，维护祖国统一是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开道与开边不可分。没有开道，无所谓开边；没有交通的畅通，也就无法维持王朝在边地的统治。所以治道与略边又成了王朝在将西南边疆纳入版图之后的长远而艰巨的战略问题。

二、治道与略边

自汉武帝开西南夷，郡县制度在西南夷地区确立之后，王朝对西南夷的经略，更是步步加深，蜀汉三国以后，虽有爨氏独霸宁州五百余年和南诏大理立国五百余年，王朝对西南边疆，尤其是云南边疆的经略，始终没有断，中原与西南边疆的联系，巴蜀与云南的联系，并未因王朝势力的消涨而失去，虽有纷争，乃至阶段性割据、独立，但统一、团结始终是主流。